

罗继祖

绝妙小品文库

绝妙小品文

时代文艺出版社

绝妙小品文库

罗继祖



* T174967 *

绝妙小品文

王庆祥 选编



时代文艺出版社

罗继祖绝妙小品文

作 者：罗继祖

责任编辑：姚家余

责任校对：姚家余

装帧设计：章桂征 封底照片摄影：胡爱华

出 版：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124号 邮编：130021 电话：5638648)

发 行：吉林省新华书店

印 刷：长春市第五印刷厂

开 本：850×1168毫米 32开

字 数：470千字

印 张：20.75

版 次：1998年6月第1版

印 次：1998年6月第1次印刷

印 数：6000

书 号：ISBN 7—5387—1210—0/I·1167

定 价：25.00元



罗继祖教授

著名历史学家罗继祖
与著名文物鉴赏家杨仁凯
切磋学术（中立者为罗先
生弟子王庆祥）。



孟夏百物滋動植一時好麋鹿樂深林
蟲蛇喜豐草翔禽愛密葉游鱗悅新藻
天和遺漏處而我獨枯槁一身在天下
骨肉皆遠道舊國無來人寇戎塵浩浩
沈憂竟何益祇自勞懷抱不如放身心
冥然任天造潯陽多美酒可使杯不燥
漁魚賤如泥烹炙無昏早朝飯山下寺
暮醉湖中島何必歸故鄉茲焉可終老

右錄白居易詩首夏

甘磧羅繼祖書



序 言

罗继祖教授及其学术小品文

王 庆 祥

罗继祖教授是我在吉林大学历史系读书时的老师，字奉高，后改字甘孺，意取鲁迅名句“俯首甘为孺子牛”，晚年自号鳃庵。又时称“新四不斋主人”，所谓“四不”者，不争奖，不参赛，不入名人录，不当顾问。老师说，要对这四者说“不”，是因为现在搞得太滥了，无裨实际。

据老师自述，原籍浙江上虞市小越镇，世代务农。五世祖以绍兴师爷起家，参河督幕，后遂流寓江淮。四世祖以捐费入仕，历官江苏高邮州知州，遂寓淮安城内为寄籍。三世祖亦以捐费入仕，历任江苏佐贰。祖罗振玉中秀才，30岁后在上海创办《农报》馆，设东文学社，受大吏委任总湖北省农务，创办江苏省师范学堂，后入学部充参事官，监督京师农科大学。辛亥革命起，遂弃官流亡日本京都，返国后仍追随清逊帝溥仪，终其身。父罗福成，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兽医科。

公元1913年4月19日，老师出生于日本京都净土寺町字马场八番地罗氏侨寓，1919年随家返国，居于天津嘉乐里，至

1929年又迁居旅顺。老师从小就受到祖父的特别钟爱，亲自为他取名“继祖”，希望他长大能继承自己的事业。老师两周岁时就被祖母丁太淑人抱来，与祖父母一起生活。老师幼时体弱多病，颇有育婴经验的祖父对其长孙的饮食十分操心。老师5岁开始识字，在祖父严格的督导训练之下，每天识生字8个，一直积累到近2000字。老师曾回忆说，祖父当时正研究甲骨文，因为教他认字，索兴把已辨认出来的甲骨文也写成方块教他，有一次还指着甲骨文问他：“你说说，我是爱你还是爱甲骨？”老师毫不疑迟地回答说：“爱甲骨！”祖父半嗔半喜地说：“你这孩子太没良心了。”

作为老师的学业的启蒙者，雪堂先生还以《桃花源记》以及唐人五、七言绝句等亲授其孙，但见其学业长进就欣喜异常。例如，老师阅读《三国演义》，自制了一份三国人物表，却把汉献帝的臣下单独列出，不与曹、魏之人相混，由此得到祖父赞赏，以为孺子尚知“汉贼不两立”，逢人便说，十分欣慰。

老师的整个青少年时代都没有离开自家书房，未入学校，故无学历，惟从祖父受学，并利用家富藏书的优越条件，在号称“小四库”的罗氏书楼内浸渍涵泳，至20岁而学成。其间遵照祖父开列的书目，熟读过的经书典籍，除四书五经外，计有《左传》、《前四史》、《资治通鉴》、《周礼》、《大戴礼记》、《亭林文集》、《书目答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切问斋文钞》、《东华录》、《国朝先正事略》等。其中《四书》是由祖父一句句亲自讲授的，老师平时喜读《左传》，读后遂觉《三国演义》只能看热闹，未必都属事实，由此奠定好读史的初基。从此书案上每天都有一大摞书，按本抽读，读得遍数多了，也就自然熟了。老师又爱读古文，觉得比经书易于上口。1929年迁居旅顺时，老师已经15岁了，祖父又重点给他讲授了《书目答问》等

著作，使他又懂得了治学应通目录学的道理。《资治通鉴》等历史巨著也是在这个时期精读的，老师涉猎更加广泛，学业迅速及于文学、史学、考古、目录、版本、诗词、绘画、书法等领域，建立起深厚的基础。

老师回忆他少年时代在祖父的教诲下和“古史辨”派的影响下，由疑古而兴著述之志，藉以走上史学研究之路那段历史时写道：“对于家学我是有心继承的，惟对古文字学不感兴趣，而对于祖父平日所搞的考证却有偏嗜。祖父在学问上所开的门路很广，特别是人家都不注意的，他注意。最先是敦煌卷轴，接着是殷墟甲骨、西陲简牍、大库史料，而牵涉他精力最多的是辑录金石遗文，毕生未竟。他一生为学不出这个圈子，而在方法上大体以乾嘉考据学为依归，我对此只能是望洋向若，只想勉力继承他的一部分，就是史学。因为上述种种归根到底离不开历史，如不具备历史常识和其他辅助科目的知识，几于无可下手。”

老师年未弱冠，已能写出《朱简河（筠）先生年谱》一类老到的考史论著，他把该文寄交《东北丛刊》发表。主编该刊的著名历史学家金毓黻先生在1931年3月29日的日记中留下了这样一段记载：“阅《朱简河先生年谱》，上虞罗继祖撰。继祖，叔言先生之冢孙也，年十八岁，于今正成此编，寄登《东北丛刊》，并嘱刊单行本，余粗阅一过，文笔雅饬，简而得要，诚可与高邮王氏并美矣！”居然以18岁时的老师与大考据家王引之、王念孙父子相提并论，老师当年已经达到的学术境界可想而知矣。

老师进而升堂入室专治辽史，二十四史之中《辽史》错漏甚多，其祖父乃嘱之利用30年代辽人墓志大量出土的机会，以出土文物校核《辽史》，老师由是缘起费时两年，写成《辽史校

勘记》，凡八卷。该书于30年代末石印问世，1958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标点刊行，与老师的其他辽史著作一起给予学术界以重要的影响，迄今仍为治辽史者必读之书。与此同时，老师还先后撰写完成《春秋异地同名考》、《程易畴年谱》、《李璘园年谱》、《段懋堂年谱》、《明宰相世臣传》、《毛文龙传》、《老莲遗事》和《辽汉臣世系表》等多种学术论著。还在其祖父指点下摹写唐人写经，领悟汉字结构，兼习山水绘画，为日后在书法和绘画领域内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雪堂先生对勤奋治学的嫡孙怜爱倍至，乃于晚年自述生平而“付长孙继祖书之”，此即雪堂先生生前手订之回忆录《集蓼编》。其祖父还为此“题四绝句”，其中有这样两句：“膝前喜有读书孙，清白家风望汝存。”其间洋溢着位鼎鼎声名的大学问家满怀希望的欣喜之情。

二

老师靠家学成才，然社会已经大变，又不能不为生活出路计，总得在社会履历栏内填点儿什么。于是，由祖父出面先为长孙谋得“满日文化协会”东方国民文库编辑职务，继而藉助旧交黑田源次博士的关系，使之转任“南满医科大学”预科国文讲师，此1939年事，是年老师方27岁。次年6月，雪堂先生病逝，老师奔丧之后继续在沈阳任教，至1941年夏转赴日本国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任讲师兼东方文化研究所嘱托，得以利用那里丰富的汉文藏书继续研究辽史。

据老师在京帝大讲课时的助手、助教高马三良说，有一次听老师讲唐诗——王昌龄的七绝《出塞》，讲到“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结句时，老师突然加重语气，足蹬地

板，声容亢厉，有异往常。高马当时就有感觉，认为老师并非如同表面的“老好先生”，每每触发激情却不失为血性男子，是一位刚直硬汉。高马当年不能说破这件事，怕招惹是非，直到20年后辗转得知老师的踪迹，才在信中讲出了自己的感受。老师说：“我见到这封信，很惊讶他眼光的犀利，能看到我的背面。实在说我是怀着敌气的，不过无从发泄，也不敢发泄。”

到1943年暑假，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败局已定，京都时有美机临顶，老师遂辞职返回长春，在“康德印书馆”担任了几个月的闲职，其间也闹出一件事来。那时伪满已把日本“天照大神”迎来了，大搞所谓“日满文化”，老师却在“满日文化协会”的一次集会上，仍大谈中国传统文化，还引用了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最后说：“士可杀，不可辱”，有点咄咄逼人了。主事人杉村勇造冷笑说：“那就请张景惠总理写一下这六个字好不好呢？”因为毕竟还有祖父生前的声望和地位作凭藉，才得以不了了之。不久就出现了“八·一五”光复的政治新局面。

当年冬天，老师冒险返回旅顺，正赶上从延安来的共产党的干部请他出面整理罗家已遭兵燹后的残破藏书，以保护中华民族的文化财富。老师慨然应允，从此投身革命，成为旅顺市人民政府教育局的一名科员。当时旅顺市内有个已废的娘娘庙，便当作临时整理处，后又迁到大连南山的两座废佛寺内，老师整理图书直到1948年。至此，老师乃稟祖母之命，以自己 and 堂弟承祖的名义，将藏书捐献人民政府，即今之大连市图书馆。其间，老师转任关东公署教育厅科员兼文物保管委员会职员，继又调入东北文物处，任职沈阳博物馆。嗣后奉派参与接收大连的原满铁图书馆，并留在旅大市图书馆参考研究部任研究员。因工作成绩突出，曾获“积极工作者”奖。1955年4月应聘转任

东北人民大学(今吉林大学)历史系讲师兼吉林省文物委员,直到离休又度过了30多个春秋。

“文革”前,老师先后开过中国史学史、中国历史文选和辽史选修等课程。老师授课要言不烦,深入浅出,且有独到见解,加之作风淳朴,爱护学生,受到系内外同志的好评。1963年秋天,因著名宋史专家邓广铭教授推荐,赴中华书局校点《宋史》,跻身于历史学界之林。虽因“文革”突发而告中止,却已完成本纪、表和部分列传的校点工作。

在漫长的“文革”年代里,老师既不附会影射史学的陈词滥调,也没有就此辍笔,他博览勤记,写下大量读书笔记和学术小品文,老师自谓这是“十年浩劫中的惟一纪念品”,其纪念意义就在于敢和“文革”中时髦的政治口号唱反调,为后来由中华书局结集出版的《枫窗胜语》一书奠定了基础。

当学术界的春天伴随“四人帮”的垮台而来到之后,老师展纸执笔,一发而不可收了。1980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永丰乡人行年录(罗振玉年谱)》。1984年对老师来说是著作丰收的年份,《春游琐谈》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枫窗胜语》由中华书局出版,《鸭江行部志注释》(与张博泉合作),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1987年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了《庭闻忆略——回忆祖父罗振玉的一生》。1989年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第二部学术小品文文集《瑾户录》,1992年由长春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为老师出版了八十大寿纪念文集《海角濡集》,1995年由台湾棋龄出版社出版了老师主编的《王国维之死》。此外老师还在海内外报刊上发表了大批学术论文和学术小品文,且以《甘孺丛稿》为总题目,分别编入系列著作。

同时,对吉林大学历史系的教学与发展,老师也有颇多建树。老师先后为历史系和古籍研究所的本科生、研究生开设

《中国历史文选》、《校勘目录学》、《论孟选读》、《东北地方史》和《辽金史》等多门课程；老师与辽金学家张博泉教授一道创办的东北地方史专业，现已成为吉林大学史学基地一项有特色的专业，并已培育出一批很有发展前途的中青年学术骨干；以老师为学术带头人的历史文献学专业也发展成为一支人员充实、特色鲜明的学术梯队，是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三个重点研究室之一。

“四人帮”垮台后，老师于1978年第一批获晋升为副教授，同年以无党派人士身份被推选为长春市政协委员。1981年老师又加入了九三学社。1983年老师获晋升为教授。1986年吉林大学建校40周年校庆时，老师因在校工作超过30年而获荣誉证书。1988年老师75岁时离休，返回大连市与家属同居，由大连市管理干部学院接受安置。此前他的社会兼职很多，是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兼历史系学术委员会委员、吉林省历史学会理事、考古学会理事、省图书馆会刊丛书顾问、省书法家协会名誉理事、全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武汉中国文献学研究会学术委员、长春市第五届政协委员兼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副主任。晚年定居大连以后，老师因年迈且体弱多病，不便出门，自认为顾而不问，又何如不顾不问，遂辞谢了所有的社会兼职。

三

与其祖父一样，老师志在于学，并不刻意书法，依然成为盛名于海内外的书法家。他自5岁始即在祖父书桌前握管描红影墓碑帖，临写最多的是颜帖和隋唐墓志，至15岁临“唐人写经”和《芥子园画传》等，得悟其形体结构之妙，杂学诸家而自成风格，沉稳老成，气清韵古，骨肉丰腴，充满着浓郁的书

卷气。其书法作品多次受邀参加国内各级书法篆刻展及日本、韩国和台港地区举办的名家书展。

早在70年代，江西九江博物馆为纪念白居易谪官江州在九江市建亭，老师应邀书写白居易《首夏》五古一首，已刻石立于纪念亭一侧。此外还曾为吉林市毓文中学、山东蒲松龄纪念馆、王士禛纪念馆、贵州遵义会议纪念馆、淮安刘鹗故居等题写馆名或联语，均已刻匾制联。至若应作者邀而作各类出版物题签，则一时间难以统计。而今老师虽已八五高龄，尚能挥毫，秀雅不减当年，曾以近作入藏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还曾获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等颁发的书画大赛奖牌。

老师能书擅画，名声在外，远近来求者络绎不绝，老师应人求不索值，称自己的字为“金不换书”。曾有香港某书局经理慕名专程来求墨宝，许以重金，老师感其诚笃，欣然挥毫为之书写条幅“含英咀华斯文在兹”和一幅联语而分文不受，令求书者感激涕零。还有一家报社主编求题签，仅四字，许以酬金500元，老师因不明其所著之内容而坚决辞谢，所以有人称老师为古之“狷者”，老师则谓，谋挽世风，应以身作则。老师年过八十，以患白内障视物不清，画不复作，惟作书。

老师生活简朴，于个人事向无所求，有人说他太老实，常吃亏，老师却说：“我倒觉得自己从来没吃过亏，一生能多有些事，有裨世用，虽吃亏又何妨。”老师在长春时居室狭窄，每有人谈及，老师辄引用司马光“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那句名言说，居室能写作、能容膝足够了。老师还自撰了一幅对联：“书斋虽小能容我，腹笥仍廉敢傲人。”老师还有个“四不”的座右铭：不动心，宠辱不惊，不与鸡鹜争食，不与燕雀比高。

老师是把终生精力都献给了祖国的文化事业和教育事业的德高望重的学者，直到76岁高龄才回归子女身边，定居大连白

云新村。在这伸向滔滔渤海的海角一隅，老师仍手不释卷，从容握笔，又度入不知疲倦的晚年。海角，不但成为老师梳理数十载学术文化成果的胜境，也是老师文思泉涌凝结新著的天地。

1992年老师八十初度，天下桃李汇聚称觞，集资出版了祝贺老师华诞的纪念文集《海角濡樽集》。1997年4月，门生、亲友以及学术界、出版界、书法界和统战部门的人士再度聚首海角山庄，为老师贺85岁大寿。老师并无权势地位，却有高风亮节、学人品格，深受学生及晚辈的爱戴。

近年来因为协助老师整理罗雪堂先生遗札，使我有机会在一段较长的时间里与老师朝夕相处，进一步感受到老师那种对理想和原则的坚定性及其人生操守的不可动摇性，也感受到老师待人以诚、宏大的气度和脱俗不凡的举止言行。我认为这些因素正是老师所具有的那种永恒的魅力之根源。我曾就此向老师请教，老师还是那样谦虚地回答说：“我无特长，不过以不自欺为上，不自欺，才能不欺人，不骗人。”老师看问题确实非常深刻，他的回答充满了哲理，寓意深远。

面对社会问题，老师也有自己的看法。他非常赞成改革开放和向市场经济过渡，但很看不惯当前商业领域里某些“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现象。他说，有些人不读书不看报，不注意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表面上洋装革履，俨然士绅，但内里却是目不识丁，草包肚皮。其实这是很可悲的，犹如高楼大厦，倘遇地震则一片瓦砾，唐山、辽南可作前车，幸好地震不常光顾，得保旦夕。老师这番话并非危言耸听，人们如能常往这上面想一想，可使此心常惺惺，对某些想入非非的人来说，也能少遏其贪财图享乐的邪念，可当一剂清凉散也。老师还说，处在今天他也有一个自我规范言行的口号，叫作“不媚外，不趋时”。

老师的晚年生活非常充实，心如光风朗月，每天都有做不完的事情。他常说：“我到了水边林下，不再承受尘世烦扰，可以静下来读书作文，门设常关，不接俗宾，但丝毫也没有忘记国计民生，每天看报，了解国内外大事，也写点儿感想。家庭里鸿案相庄，儿女服役，照拿教授的工资，不虞饥寒，实为天之幸民也。而今渐近米寿，治学涉世，或能取得‘无愧’二字，也甚不容易了。古人说不破不立，我现在总可以算作有破有立了。”

综观老师的治学经历，确以家传为根基，而以史学为主干，旁涉历代史学文献和典章制度，凡前人言行之可法足戒者，罔不包罗。落笔为文，清新简练，有韩愈、柳宗元遗风，记事务真实，尤恶裨官燕说。老师自谓，早年为学为文，尚以为愈古愈好，至晚年有变法，注意点专在明清以降，以至近现代，笔锋所触，罔顾忌讳。老师还自我总结一生思想写成文章，收入吉林大学校庆50周年之际由各学科十几位著名教授应邀撰文而编成的《我的学术思想》一书，题为《我的学术思想形成的前前后后》，内容突出七端：尊儒尊孔，反封反殖，良史直笔略古详今，悲天悯人，同情弱者，针砭世风，离休余热。老师说，前五者为立言主旨，后二者为个人当前言也。这是他求学治学80年“破而能立”的总结，并将终身以之。

四

老师撰写学术小品始于1961年，其时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文物、书画界名家张伯驹先生从北京来到长春，他是经陈毅推荐来任吉林省博物馆第一副馆长的。遂通过老友于省吾介绍，与五六位同好相邀聚会，或鉴赏品评个人藏品，或吟诗

作画、临池挥毫，或神聊书山艺海，或京剧清唱。继而又得到省政协的支持，有了“吉林省政协书画小组”的名义，每周活动一次，并在政协雅致的餐厅小聚。其间由张伯驹提议，赴邀人士每次要交一篇杂文、随笔或学术小品，凑成一卷即由张先生自费刻写油印，发给入会者人手一册，以张伯驹曾收藏一幅隋朝展子虔游春画而命名为《春游琐谈》。

不料在极左的年代里，竟由此获咎，无端生出一个莫须有的所谓“春游社”来，受到长期的追查。到了“文革”期间，追查得更加厉害，连仅仅到场看望过张伯驹等人一次的省委宣传部长宋振庭也被牽扯上了。老师则因为多写了几篇学术小品文而被扣上一顶“春游社黑干将”的帽子，为此不知经受了多少次批判斗争。他写的一篇《斩上书人》被斥为“为右倾机会主义呼冤”，而另一篇《讼堂养猪》则被指为“谩骂党的干部是猪”，对此老师一笑置之。1984年，张伯驹主编的《春游琐谈》，终于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内收老师撰写的学术小品数量最多，达33篇。

十年浩劫中，史学界流行“影射史学”，老师嗤之以鼻，但并未因而封笔，夜夜有灯下生活，效仿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南宋洪迈的《容斋随笔》、明末顾亭林的《日知录》和清代钱大昕的《十驾斋养新录》等笔法，“以史事为纲，旁涉人物评鹭，不剿袭陈言，遇谬误则加驳正，言之有物且笔挟阳秋”，写下一篇又一篇学术小品文，真可以用“绝妙”二字形容之。

老师回忆当时的情景时写道：“时逢浩劫，几罹禁网，于是动色相戒，殆将焚笔砚矣。嗣是讲舍尘封，予亦键户寡营，乃复拥卷占毕，盖舍此无以遣日，举世方喧尅，若弗闻也者。”“文革”结束后，老师把“浩劫中的惟一纪念品”汇为一编，定名为《枫窗胜语》，义取寓居窗外有一棵枫树故也。该书凡16万

余字，内容分史札、尚论、表徵、文物（上、下）、东北史丛话和杂俎六项，计 200 余篇，短则百字，长则千言。该书出版前，我国著名古文字学家于省吾教授看过，他认为“文章短，题目也不大，却比长文章、大题目更解决问题”。先秦史专家金景芳教授也认为该书“辞旨简练，不同凡响”。历史学家陈连庆教授评价该书“词必己出，意度波澜有法”，能“以少许胜人多许”，“非泽古多通者不能”。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吉林大学数学系江泽坚教授也对这本书盛加奖誉。还有著名作家柯灵称赞该书“广闻博识，翻读未竟，已觉兴味盎然”。

老师由是一发而不可收，继又以 1980 年至 1987 年间的续作辑为一编，此则老师第二本已经出版的学术小品文，定名为《瑾户录》，正如老师自述所说：“天既夺我游观谈宴之乐，遂不得不以怀铅握槊为事，穷冬瑾户，纸墨疲瘁，过而存之，犹前志也。”是书既出，被学术界誉为当代的《容斋随笔》。

老师自幼在书房熟读唐、宋散文，尤喜韩愈、柳宗元之文体，撰文尚简，数十言可以成篇，而对于干净利落的文言一直保有特殊感情，自谓文言文当年被胡适指斥为“桐城谬种”之际，老师亦不为所动，故《枫窗》、《瑾户》两书仍以文言写就，颇具韩、柳之风。

老师学写语体文较晚，据其自述于此颇受思泊老影响。于省吾教授早年作文规摹桐城，但在新中国成立后决然舍去，专一写白话文，且怀揣小册子，每获稀见新词语辄摘抄于册，以防遗忘。思泊老还曾向老师介绍他的经验说，写白话文也要找老师，如叶圣陶、吕叔湘都是。老师深为思泊老的精勤所感动，遂找来叶、吕两位先生的著作来细读，渐渐形成一种带有文言韵味的语体文，从而有了别具一格的自己的文风。

自 80 年代晚期以来，老师以这种新的文体写成的千余篇文